

中国  
当代

文学理论

潮流三十年

(1949-1978)

方兢 / 著

zhongguodangdai

wenxuelilunchaoliu

sanshinian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当代

文学理论

潮流三十年

(1949-1978)

方兢 著

zhongguodangdai

wenxuelilunchaoliu

sanshinian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潮流三十年：1949~1978 / 方兢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5

ISBN 7-5059-4663-3

I. 中… II. 方… III. 当代文学—文学理论—中国—1949~1978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1005 号

书名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潮流三十年(1949~1978)
作者	方兢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冯善雅
责任校对	李兰华
责任印制	冯善雅
印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307 千字
印张	13.5
插页	2 页
版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9-4663-3/I · 3642
定价	23.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 绪 论

本书所做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与热闹的新时期文学研究相比,建国后三十年文学的研究显得格外冷清;关于这三十年文学理论研究,就更加沉寂了。这也许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没有取得什么成就,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不大。<sup>①</sup>这似乎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然而,对于这一时期文学的研究,又有着新时期文学研究所不能替代的意义。这就是总结经验,反思教训,为建设新的文学理论提供资源和警策。因此,对于这三十年文学理论的研究,意义就更加重要。其重要之处,是因为这一理论一方面连接着三十年的文学创作实践,一方面连接着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新时期开始几年后,文学创作实践就逐渐进入了自然、自发的状态,与文学理论基本脱节;但是另一方面,这一文学理论却以完整的体系形态保存在高等院校的教材中,成为社会上普及的文学观念。因此,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与其他历史时段相比,现实意义就更为显著。

### 一、当代文学的开端与特点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本书在这里以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作

为当代文学的起点。因此,本书所论述的当代文学理论潮流,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很多论著将当代文学的开端确定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这种以国家或社会的政治阶段来代替文学阶段的文学史划分原则,曾经在文学学术界占据着主导地位,被普遍应用。以此原则来划分,近代文学的起点是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现代文学的起点是 1919 年 5 月 4 日的“五四运动”。这一原则运用在当代文学中的阶段的划分,即是从 1949 年 10 月 1 日至 1966 年 5 月 16 日为第一个阶段,一般称为“十七年文学”;第二个阶段是从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制定“5·16 通知”标志“文革”开始),至 1976 年 10 月 6 日“四人帮”被逮捕,称为“文革文学”;第三个阶段为“新时期文学”,从 1976 年 10 月 6 日至今。

关于当代文学的范围,目前高等院校的学科划分都是从 1949 年开始到今天,而且正在延续中。但也有把 1949 年以后的三十年间称为“当代文学”,并且认为与“新时期文学”是两个不同的、相对独立的阶段。<sup>②</sup>如果不局限于社会政治阶段的特点而深入到文学理论的层次来把握其特征和发展,就会发现把这一时期划为相对独立的一个阶段无疑是正确的。本书也认为从 1949 年 7 月到 1978 年 12 月是一个整体,具有文学史意义。至于当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命名,则并不那么重要。或者按照现在通行的高校学科划分,把当代文学界定在从 1949 年开始到今天的五十五年,那么前三十年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而新时期则又是一个阶段。

文学当然与国家的社会政治相关,并且受到社会政治变革的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尤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政治为主导、为决定的社会,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特别是自 20 世纪以来,这一现象就更为突出。但是,文学同时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着自身的发生与变迁的规律。本文在这里将当代文学的

开端确定在 1949 年 7 月初,当然与一个新的政权的建立相关,但并不在于 10 月 1 日开国大典的仪式。虽然承认“十七年文学”中的一些要素在 40 年代前期甚至更早就已经出现,然而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开始,无疑是起自第一次文代会。

这个新的文学时代的特点是:

一、文坛结构重新调整与组合。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左翼作家队伍汇合并成为文坛的中心,以前处于中心位置的大城市的作家迅速边缘化或者退出文坛。经过新的调整,形成了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的文坛。这个文坛的真正的核心,则是担任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领导职务的理论家和作家。他们主要是来自解放区的老资格的党员。

二、新的文学制度的建立。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建立,起到了管理作家并指导文学创作的作用。文联和作协实际上是国家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在对作家的管理方面,以其强大的政权机器为背景,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作家对于文联和作协,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尤其是驻会作家,人身依附的性质几乎是彻底的。在此基础上,文联和作协把党和政府的文学政策和文学理论进行强制的、有效的贯彻。

三、文坛统一的另一个标志是文学价值评价标准的统一,包括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这一价值评价的原则和标准,源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价值评价的原则即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价值评价的标准即是文学艺术服从于政治和党的中心工作,为工农兵服务。文坛的统一决定了文学的统一。

四、文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并确立了一元化的绝对地位,全面、系统地运用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所起的作用,在中国文学史甚至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一个特

殊的时期。

正因为当代文学有这样一些特点,所以被认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历史时期。虽然在文学作品的某些原则上、精神上与40年代解放区文学相似,如“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sup>③</sup>但在对文学艺术的管理上,则是具有组织化、制度化的特点。这是一项根本性的变革,使得政府有了专门的文学艺术的管理机构,并且对文学艺术进行制度化的管理。政府对于文学艺术的政治要求、宣传口径以及创作方法等具体的文学理论,都得以有效的贯彻和执行。由于上述当代中国文坛独特的结构和制度,决定了当代文学的特点。自当代文学的开端起,这些特点贯穿了三十年。主要表现在:

一、党和政府的文学政策决定文学理论,文学理论指导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文学理论文献,基本上都是文学艺术界领导人的报告和文章。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特点,偏于政治性、政策性,而疏于学理性。

二、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有着极度密切的关系。文学理论的讨论、论争等论著,基本上都是用来指导创作的;另一种形态的文学理论,则是对文学作品的批评和批判。这也是对文学创作进行指导的一种方式。学院式的纯理论研究极少,并处于边缘状态。

三、文学创作的潮流基本上是自觉的、自上而下提倡的,少有自发的、自下而上产生的。自发产生而能够成为文学潮流,也是需要中央认可并且提倡才有可能,如李准的《不能走那一条路》经《人民日报》转载并加“编者按”提倡,引发了写农村合作化道路的文学潮流。真正自发的文学潮流,仅有1956年贯彻“双百”方针后的一年。由于文化控制一度相对松弛,出现了王蒙等人的少量的作品,但很快就被“反右派运动”扼杀。

四、由于文学潮流基本上是自觉的,所以是理性的。作家对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学理论高度认同,无论是作品内容和倾向,还是文学理论的应用,都是理性的。少有不同的以及潜在的文学思想和理论。

## 二、毛泽东批示的影响

确定1949年7月为当代文学的开端,那么,当代文学的理论来源,显然是在这之前更早的时间。这就是40年代毛泽东的有关著述和言论,主要是《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本书对此做了详尽的分析。

建国以后,毛泽东更直接、更具体地领导着文学艺术工作。他的一系列讲话、批示和决策,都给当代文学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同时也决定着文学运动作为一颦又一次政治性运动的兴衰,并且影响了当代文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向。毛泽东对于当代文学理论的影响如下:

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年5月20日,经毛泽东大幅度修改、定稿的《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发表,严厉批评了对武训和《武训传》的赞扬,认为歌颂什么、反对什么是立场问题,形成了建国后文化思想领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开创了对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进行政治批判的错误先例。毛泽东并对随后发表的有关武训及《武训传》的文章进行大量修改。

对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认为李希凡、蓝翎的两篇文章“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的红楼梦研究



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10月27日批示同意陆定一关于展开《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的报告；并且修改了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提出批判冯雪峰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随后在文艺界、学术界形成了对俞平伯的围攻，并发展到对胡适的政治、学术、哲学观点的全面批判，把学术批评变成了政治运动。

对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发展到把胡风等一批作家定为“反革命集团”。1955年1月12日，毛泽东修改中国作协关于公开印发胡风给党中央报告的部分内容的说明；15日，对胡风问题批示：“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5月和6月，为《人民日报》三次发表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写了十七条“编者按语”；三批材料编印成书后，毛泽东又写了序言、批语和注文。随后，又几次批示肃清“胡风反党集团分子”，发展到在全国展开“肃反”运动。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与音乐工作者谈话，并发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就如何对待民族形式问题和外来文化的问题说：“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随后，全国报刊展开了音乐“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

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指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强调现在应该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还应注意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6月8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发出，“反右派运动”大规模开始。

1958年1月，毛泽东为张光年大量修改、加写《文艺报》专栏《再批判》的“编者按语”，批判王实味、丁玲、萧军、艾青、罗烽。2月，为周扬增补、修改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报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由《人民日报》发表。对文艺界“反右派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文艺界“反右派运动”迅速扩大化。

1958年3月至5月，多次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应该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后由周扬在6月1日的《红旗》杂志上公布。“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便成为文学艺术创作必须遵守的法则，不能违反。

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批判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提出了“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理论。

1963年，在多次讲话中批评文化部门，指出：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又说，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曲，大量的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果不改，文化部就要改名字，改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的一份《情况汇报》上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

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说:电影、戏剧、文学,不反映现代工农是不好的。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意识形态,应反映工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提了几十年了,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嘴里赞成,实际反对。包括一些党员、党外人士,爱好那些死人,除了死人就是外国人,外国人也是死人,反映死人,不反映活人。6月27日,毛泽东又作了第二个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1965年,布置周扬批判夏衍、田汉、阳翰笙等人。

1966年2月,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毛泽东三次修改定稿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于4月10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向全党发出。一个多月后,“文化大革命”爆发。

### 三、当代文学理论潮流的特征

本书选取了当代文学中的人物,题材,为政治服务,创作方法,

真实性,阶级性与人性这六个最重要的理论潮流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所谓文学理论潮流,指一个文学理论问题是某个较长时段的文学时期中的重要理论,对这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有重要影响,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且有一个发生、发展、演变及终结的过程,因而也导致了某一种文学创作潮流形成。至于纯学院性的、与创作无关的文学理论研究,很难称为是文学理论潮流,对考察一个时代的文学史也没有任何意义,本书将不予关注。

能够称为潮流的文学理论,应该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规模性,这一理论在文坛上是普遍讨论的话题,并能影响当时文学创作的形势及格局;二是主导性,这一理论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有重大影响或起决定性的作用;三是历时性,不是稍纵即逝的短时出现的某一理论热点,而是有渊源、有发展地延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自1949年始的当代文学,处在一个较为完整的、严谨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因此,这是一个一元化的文学理论;也决定了一元化的文学时代产生。在这样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各个文学理论潮流都只是其中的一个范畴,并且各个文学理论潮流之间,都有深层的、紧密的关联。

人物问题是当代文学理论中的首要问题,也是这一理论体系中的核心问题,与题材问题,为政治服务问题,创作方法问题,真实性问题,人性与阶级性问题,都有直接的联系。

题材问题是人物问题的基础,描写什么样的人,首先就要写这类人物的生活。当代文学是以工农兵新英雄人物为作品主人公的,就只能描写工农兵的生活,不能描写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生活。题材问题和人物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的侧面,也就是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问题。只有描写新英雄人物的生活、斗争、成长的环境,把新英雄人物放在这样的环境中去,更重

要的是放在激烈的矛盾、斗争中去,展示他的性格、意志、能力,才有可能写好新英雄人物。

为政治服务,就是为工农兵服务。毛泽东说:“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sup>④</sup>这里所说的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就是工农兵的政治。因此,文学艺术就是写工农兵的,写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写工农兵的革命经历以及革命中的政策、任务和某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就要写工农兵的阶级斗争,为革命的阶级夺取政权、保卫政权作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当代文学的为政治服务,就是为多数人的政治服务,也就是为工农兵服务;因此,只有写工农兵的生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在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中,包括了对于人物和题材的规定:写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创作方法问题,是保证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基本方法,是选取题材、构思情节、刻画人物、提炼主题、反映社会的根本原则。只有用最先进的创作方法,才能正确地描写新英雄人物产生的环境和成长的过程,才能成功地塑造出最理想的新英雄人物;只有用最先进的创作方法,才能写出新英雄人物的真实的本质,也就是先进阶级的阶级本质,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的本质;也才能反映出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真实性问题,关涉到人物问题、题材问题、创作方法问题的作品价值与评价标准。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真正的真实,在不同的立场上有不同的看法和结论。反映新英雄人物,反映英雄人物斗争成长的社会环境,就要反映出人物和社会的尽可能深刻的本质。本质的真实,就是艺术的真实,是真正的真实;而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客观存在的事件和人物,只是现象的真实,因此对于文学艺术来说,并不一定是真实的。运用最先进的、最革命的创作方

法,是文学艺术作品达到真实的手段、途径和法则。

人性与阶级性问题,也是人物问题的一个方面。在阶级社会中,人都是被划分为阶级的。纯粹的人性、超阶级的人性是不存在的。作品中人物的所有言行,都应该具有阶级性和鲜明的阶级意识,对于新英雄人物来说,这一特征应该更加突出。

当代文学的各个理论潮流的演变趋势,都受到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和政治环境影响,共同向着越来越极端的状态发展。理论的内容和逻辑也是越来越简单化、绝对化,也越来越显得生硬和粗暴。在这期间,只有两次短暂的开放,大约都只有一年的时间。1956年6月至1957年6月,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环境里,还有些真正开放的意味,涌现出王蒙等人的一小批“写真实”、“干预生活”的文学作品,和秦兆阳等人对建国以来文学理论和文学政策质疑的论文。然而,知识分子经过“反右派”、“拔白旗”和“反右倾”的运动斗争,已经被打倒的失去了写作的权利,没有落马的都成为惊弓之鸟,因而在1961年至1962年夏的文艺政策调整时期,从文学作品来看,很难说得上开放,顶多可以说是松了一口气。这也许可以比作两次激烈战斗中的休息。当代文学史上所说的“散文年”,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这样产生的。而且“散文年”中的很多作品,也是无视灾难闭上眼睛唱颂歌,如刘白羽、杨朔等人的散文。只有少数作家写了短小的历史小说,曲折地表达了不满的情绪,如陈翔鹤写了《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黄秋耘写了《杜子美还家》。然而在文学理论方面,情况与五年前有所不同,主要是由文艺界领导人如茅盾、邵荃麟、张光年、夏衍等人在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后,提出了较为符合艺术规律的文学理论主张。

当然,各个理论潮流也有自己的发展演变的轨迹。

人物问题,在当代文学的开端时刻,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就已经确定了:写新的人物,写工农兵的英雄。在共和国正式

成立之前就展开了争论,这就是“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也就是能不能在作品中以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争论的结果当然是不可以的。发起这场讨论的《文汇报》和责任编辑唐弢都作了检查。写新英雄人物的提倡以及如何写好新英雄的讨论,能不能写英雄从落后到转变的过程,讨论的结果是不要写这样的过程。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写新英雄人物正式被确立为最重要、最崇高、最中心的任务。关于写英雄人物的讨论,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缺点,从1952年起断断续续延续了十年,到1962年陈毅传达了毛泽东说的“写英雄人物要抓住他主要方面,主要方面是好的,细节问题就可以忽略,可以不必写”,<sup>⑤</sup>讨论终止,必须执行的结论也就出来了,这就是写英雄人物不能写缺点。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代以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指导下,塑造人物越来越向理想化、模式化、阶级标签化发展。在批判“写中间人物”的同时,1964年江青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发表了《谈京剧革命》的讲话,把塑造英雄人物作为“首要任务”提出。毛泽东在江青的讲话稿上批示“讲得好”。<sup>⑥</sup>1966年4月经毛泽东三次修改定稿<sup>⑦</sup>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江青亲自培植的样板戏,以及浩然等人在“文革”中创作的作品,都把人物塑造得“高、大、全”,即英雄形象高大完美。人物问题到这时已经发展到了极端。

题材问题,也是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就已经确定的。周扬说的“新的主题”,实际上就是题材。而且他从题材的角度统计了解放区的文学艺术成就。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中,形成了“题材差别论”、“题材决定论”的理论,之后又形成“重大题材”、“尖端题材”的概念。1963年柯庆施提出了“写十三年”的口

号,而且在同周恩来等人的争论中占了上风,得到了贯彻落实。江青则在第二年的《谈京剧革命》的讲话中,强调“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建国十五年来现实生活,要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sup>⑧</sup>6月27日毛泽东关于文艺的第二个批示中,说“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sup>⑨</sup>就是对题材问题的批评。在这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支持革命现代戏的一种姿态,四个月内连续七次在公开场合观看,这在历史上是仅有的事情。“反题材决定论”在1966年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被确定为“黑八论”之一。题材问题最后在“文革”中发展到了写走资派、写“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的阴谋文学。

文学为政治服务,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中的最根本的问题。文学艺术是一支文化的军队,是战胜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当代文学刚刚开端时,文艺界领导人就提出了“赶任务”、“写政策”的口号,在“大跃进”年代,掀起了“写中心、画中心、演中心”的热潮。在1962年党的八届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小说《刘志丹》“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sup>⑩</sup>由此又产生一个批判的模式和一个文学艺术的定义,即“反党”小说、“反党”电影等,以及“文学艺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此后,一大批文学艺术作品被这样批判,作家遭到迫害。与此同时,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提出后,写阶级斗争的作品随即涌现,发展为“文革”中的批判和创作。

创作方法的理论是从苏联引进的,是要求作家在进行创作时必须遵循某种原则。当代文学在开端时,提倡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正式确立,成为作家必须遵守的文学制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作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



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也就是说要写出社会的规律和发展趋势。第二个阶段是在“大跃进”中毛泽东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更多地强调了浪漫主义,但在实际的运用中则是脱离实际的理想和幻想。第三个阶段是根据“样板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三突出”。这三个阶段是一个一脉相承的,逐渐绝对化、极端化的发展过程。

关于真实性问题,在当代文学开始的时候,提倡写真人真事,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英雄模范人物。这实际上是一项暂时性、策略性的政策。这是因为多数作家当时处在创作转型的阶段,他们以前从没有接触过英雄模范,更没有写过这样的人物,为了使他们在创造新英雄人物时能够有具体的原型和素材,因此,当作家基本上适应了写新英雄人物的文学模式后,就提倡要写出艺术的真实,也就是本质的真实,即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新英雄人物的本质,不能停留在现象的真实上,提出写应该有的样子和可能有的样子。由此发展到仅仅写本质的概念,产生出大量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和阶级标签化的人物;同时也有仅仅写社会发展规律的作品。到了“文革”期间,提出了不能受真人真事的局限,写理想中的英雄人物,于是产生了“方海珍”、“柯湘”以及“高大泉”这样的人物形象。

#### 四、当代文学理论的评价问题

本书梳理了这样几个延续了三十年的文学理论潮流,理应作出一个评价。这是不该回避的。

关于对当代文学理论的评价问题,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也是非常艰难的工作。在新时期的初期,关于人性和共同美的讨论,文学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讨论,文学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的讨论,文